

# 薛毅：改革干部终身制的先驱



1974年薛毅在青海地质十三队

薛毅，地质部离休干部。

1923年，出生于河北完县（今顺平县）城区一个贫民家庭。

1938年，八路军到了他的家乡，15岁的薛毅投身到了抗日战争的洪流，第二年他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他虽然只高小毕业，但在战争年代就已写出不少生动的宣传报道。曾任北岳三分区和五分区新华社社副社长，专事解放战争和土改的通讯报道工作。共和国成立前后任华北局宣传部干事、华北文化局文化处副处长等职。

1954年，为支援工业建设，他调入地质系统，先后任地质部政治部办公室主任、地质部办公厅政策研究室主任。

1957年初，地质部机关党委传达了中共中央“关于干部职务稳定提高”的方针后，薛毅对中共中央实行干部职务冻结式的稳定提高方针很有看法，认为这是搞干部职务终身制，不利于提高干部队伍的素质，也不利于根除官僚特权思想，更没有民主监督的机制。于是在开展反对主观主义、官僚主义、宗派主义的整风运动期间，薛毅写出了题为《改革干部选拔使用制度刍议》的文章，并附了一封给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信投寄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和《人民日报》。这对于某些刚刚因打下江山，担当了领导职务并希望永远世袭下去的干部们，无疑是一种强刺激。他必然地遭到了灭顶之灾，被定为极右分子。他的妻子和胞弟因受他的株连也被划为右派。地质部机关因支持《刍议》观点而被划为右派和中右者达一百数十人之多。薛毅下放青海劳动达22年之久。在那里，他仍执著于自己的信念和理论兴趣，又因为写《果真“有了正确路线就有了一切”吗》一文，再次遭到新一轮长达半年之久的批斗。

较多的看法认为定息不是剩余价值。而章乃器说：“既然定息不是剩余价值。也就不应该说定息是剥削。而只能说是勤劳而获的收入。”我认为正像党外人士任正部长的。另外，如果某些人、某些环节犯了主观主义、教条主义的错误，并不都应归咎于上边负责。这个道理是容易讲清楚的，不应提出这种意见的人一棍子打死。这样不就破坏了整风中提倡的“言者无罪”的庄严保证？也会失信于民。所以我表示了为储安平鸣不平的意见。

关于章乃器说“20年定息非剥削，只是不劳而获”的说法，也应该承认这只是学术观点的论争。因为当时比

敢，岂敢。——它幽默而微妙地传达出民主人士在经历了1957年以后一系列政治运动的畏惧心理。然而，一切畏惧都是先从不畏惧开始的。

那么对您的文章关于上岗考试，可以竞选啊，可以自由选择职业啊，批判时是怎么说的？

薛：当时批判我说，让老干部下台，就是让党下台，让国民党卷土重来。说我的主张都是资本主义的、修正主义的。

那：您当时参照了哪些思想？您当时看了一些什么样的书，受到了启发呢？

薛：恩格斯就提过自由选择职业的问题。

那：您的思想是从马恩那

是回到招待所。休整学习，1963年回到地质队，搞了一年机关生产。

1964年春夏之交，就到了果洛地质队，在果洛藏族自治州。在那里闹了一场病，咳嗽，全身过敏、搔痒。

我从12级降到18级，钱降了一半，自己留20元钱，其余都寄到了家里，家里有老人孩子啊！在青海呆了22年。

1970年调青海东部地质队。当时《青海日报》有一篇文章《领导班子革命化建设的根本》大肆宣传有了正确路线就有了一切。我呢？根据自己的经验，在华北局我就管时事政策宣传，审查各省报宣传的问题，爱用居高临下的眼光找毛病。所以，我看《青海日报》还是习惯性地用这种眼光，就写了一篇《果真“有了正确的路线就有了一切”吗？》的文章。引经据典地反驳了它。用的是笔名：莘劲矛。

《青海日报》到地质队一了解，莘劲矛就是我，还是个右派，就加批判性的按语发表了的文章。然后，地质局又组织批斗了我。我当然不服气，给《红旗》杂志写了篇文章《一个问题的争论及其发展——续一》。我是想学“九评”和他们连续论辩一番的，可见当时多么天真。批斗我，我不服，和他们辩论，他们辩不过我。后来领导让我别对抗，说“有了正确路线就有了一切”是毛主席讲的。我问：毛主席在什么场合讲的？他说：“你是什么人啊？怎么能告诉你啊？”这样挨批斗过了半年多。《青海日报》大约每过一个礼拜就发一个版的文章来批判我。后来又让我到各地地质队接受批判。但没有搞“喷气式”。

那：您怎么看当年写的关于干部选拔的那篇文章。

薛：我没有错。

那：您的理论来自马列主义。您觉得您的观点和西方民主主义的竞选和宪政有没有关系？

薛：我没有想过这些。我只希望在党内以及党外建立起一种能对党和国家最高领导、最高决策环节进行监督和制约的机制，有一个能保障人们正常的言论自由、言者无罪的环境，让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这类悲剧，永远不再重演！

那：您被划为右派的问题，是哪一年改正的？

薛：华国锋在台上时才开了个小口，我还记得当时11号文件的说法：只有那个别、确实、完全错了的，才给予平反。我向地质部提出了申请，要求甄别。地质部政治部一个干部，盛气凌人地对我说：“你认为你就是那个：个别、确实、完全错了的吗？”我说：“当然是。只有甄别，才能知道是不是错了！”后据了解，这个人的外号叫“高水平”。后来中央又发了55号文件，才使大部分错划右派被改正了。

（薛毅口述 邢小群采访来源：《口述历史（第三辑）》）



那：薛先生，我看了您当年写的《改革干部选拔使用制度刍议》和有关的材料。应该说几十年前，您就在体制内明确提出了不能搞干部职务终身制的问题。这个问题真正得到承认才是近十多年的事，在“十六大”会议上，原中顾委委员李锐先生还在继续提出党内民主化、废除领导干部终身制和变相终身制的问题。这个问题，越来越成为全党全国人民的共识。我知道您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。作为一段历史，我想请您谈谈您的经历。

薛：1956年底，机关党委传达了一项中央关于干部稳定提高的方针。从名称上看不出什么问题。传达时说，干部不提拔了。还说，毛主席说了：不是不提拔，死了的就补。传达时，还讲，刘少奇说：每个人都得准备一辈子担任现在这个职务。要做好这个准备。他还说，比如：在一个科里，有一个科长，十个科员，这十个科员，就得准备一辈子当科员。除非这个科长死了，才能从这十个科员中挑一个当科长，其余的还得继续当科员。刘少奇所做的就是这种解释。我听了很反感，这不成了终身制了吗？蒋介石当国民党总裁，是终身制，我们共产党怎么也搞终身制了呢？也许一般的同志没有办法，很无奈。而我对这个问题，思考得比较激烈，尖锐！

有了这些思考，我就写了《改革干部选拔使用制度刍议》这么一篇文章。在1957年的5月份写的。正式交上去是6月8日。这一天正是由停止整风转向“反右”。

那：正是这一天送出去的？

薛：是的。但他们还得承认我是在整风时写的。

那：当时您的职务是？

薛：地质部办公厅政策研究室主任。

那：您是先送到地质部党委去的吗？

薛：不，是先送的中央。我自己寄出去的。地址是：中共中央政治局毛主席收。同时，我还给了《人民日报》一份。我没有给地质部。因为我是对中央的政策提建议。地质部办公厅主任叫刘毅，这个同志比较欣赏我。他主持办公厅的整风会时，让我发言。我说已经给中央写了建议。他说那你可以启发启发大家。我就简单地说了说。他们出《整风简报》，一个小同志把我的讲话写了一个小通讯。他写的不能代表我的整个观点的全貌。我说你要反映我文章的全貌，必须登我的全文。他们就在地质部的《整风简报》上登了我的《刍议》全文，四版全部占满了。那期成了我的文章专刊。这时，已经是6月8号以后了。

那：群众看了您的文章，反响怎样？

薛：刘毅告诉我，群众反映态度有四种，可用四句话概括：一种是全部反对；二种是全部赞成；三种是部分可取；四种是精神可嘉。最后这一种意见是，你的文章不管对错，能写出来向中央反映，精神就是好的。从四种态度看，总的来说，多数人是持肯定态度的。

那：您在给中央的信中还提到特权的问题，您是怎么把这个问题同终身制问题联系起来考虑的？

薛：终身制极容易造成干部特权思想。当然现在的权力腐败是那会儿想像不到的，但当时让他们把现有的领导职务视为“保险柜”、“金饭碗”，是很容易助长领导干部向贵族化倾向发展的。不钻研业务，听不进群众的批评意见，甚至打击报复群众，不但某些领导干部丧失了进取